

基于人智协同的国家级非遗仙桃雕花剪纸对外译介路径研究

谭玉茜, 倪 然, 柯细香

武汉纺织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9日

摘 要

仙桃雕花剪纸属于湖北仙桃国家级非遗, 其风格以楚文化为基本底色, 所用纹样大多有民俗含义或吉祥寓意, 但目前其外界传播常因翻译而受阻: 人工处理太费时、产量少; 一般机器翻译往往只译其表, 难译其里; 专业术语没有统一规范。本文将人智协同当作中心思路, 引入共生理论及多模态翻译方法, 提出“AI初译 + 术语检索 + 多方案生成 + 人工审美校验与文化等效判断”实操流程与“非遗文本 - 视觉符号 - 文化语境”三重关联的多模态翻译模型, 以仙桃雕花剪纸为实例, 对工艺术语、纹样传统、典型作品作系统梳理, 完成中英双语术语的对应整理。从实际效果看, 本研究所倡导的人智协同方案有助于提升非遗文本雕花剪纸的翻译效率, 文化内容不会失真, 因而可为其他非遗外译提供借鉴。

关键词

人智协同, 仙桃雕花剪纸, 非遗翻译, 多模态翻译, 对外文化传播

Research on the External Translation Paths of Xiantao Carved Paper-Cutting (National ICH) Based on Human-AI Collaboration

Yuxi Tan, Ran Ni, Xixiang K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Received: September 16, 2026; accepted: October 19,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9, 2026

Abstract

Xiantao carved paper-cutting is a national-leve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Xiantao, Hubei Province. Its style is fundamentally rooted in Chu culture, and most of its patterns carry folk meanings

文章引用: 谭玉茜, 倪然, 柯细香. 基于人智协同的国家级非遗仙桃雕花剪纸对外译介路径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0): 507-515. DOI: 10.12677/ml.2026.14101021

or auspicious connotations. At present, however, its dissemination is often hindered by translation: manual processing is time-consuming and yields limited output, while general machine translation usually renders only the surface and struggles to convey the underlying cultural meaning. Moreover, there is no unified standard for specialized terminology. This paper takes human-AI collaboration as its central approach, introduces symbiosis theory and a multimodal translation, and proposes a practical workflow of “AI preliminary translation plus terminology retrieval plus generation of multiple options plus human aesthetic review and cultural equivalence judgment,” as well as a multimodal transl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threefold correlation of “ICH text-visual symbol-cultural context”. Taking Xiantao carved paper-cutting as a case study,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craft terminology, pattern traditions, and representative works, and compiles corresponding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terminology. In terms of practical results, the human-AI collaborative approach advocated in this study helps improve the translation efficiency of ICH texts on carved paper-cutting while preventing distortion of cultural content, and can therefore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other ICH items.

Keywords

Human-AI Collaboration, Xiantao Carved Paper-Cutting, ICH Translation, Multimodal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源。规范、高质量的对外译介是非遗实现国际传播的基础前提。然而，在实操层面，国内大量非遗项目缺乏规范的对外译介材料：专业术语翻译不统一，或仅做字面转换[1]，海外受众往往止步于视觉欣赏，难以理解深层的文化逻辑。

近些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同非遗翻译研究之间的结合变得越发紧密，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孙嘉敏选择新会葵艺为研究对象，构建了“AIGC+多模态翻译”的传播模型，借此说明生成式AI在把非遗多模态内容转成其他形态时，能够发挥赋能作用[2]；陈卫红等发现，数智技术的出现，让非遗在跨文化译介上有了新机会，并主张一种协同译介模式，即多元主体与智能平台之间要形成联动[3]。在剪纸细分领域，相关译介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郑泽蕾等以知识层级为切入点，围绕剪纸非遗术语，将其翻译理据加以构建，并将术语分成物质层、行为层与精神层，这给剪纸术语的标准化处理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4]；乔晓光提到，中国剪纸这些年在国际交流上一直在深化，可各地域流派之间的译介水平参差不齐，不少地方剪纸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外译体系[5]；阜阳剪纸等地方剪纸项目也普遍存在传播体系不健全、文化内涵传递不足的问题[6]，仙桃雕花剪纸同样面临这一困境。在翻译模式层面，人智协同已经成为比较明显的演进方向，相关研究表明，翻译模式不再停留在传统的人工主导上，而是慢慢形成“AI初译+人工审校+反馈优化”的标准化流程，让翻译效率与质量这两端能有较好平衡[7]。多模态话语分析也已被广泛应用于非遗外宣翻译实践，为图文类非遗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框架[8]。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多聚焦于通用非遗文本的翻译流程优化，针对剪纸等视觉类非遗的多模态协同译介研究较少；对人与AI在翻译不同阶段的共生关系演变探讨不够深入，理论支撑有待加强；视觉符号解码的技术路径表述较为笼统，技术依据不够充分。

仙桃雕花剪纸在民间也被称作沔阳雕花剪纸，它属于江汉平原上世代相传的一种传统手艺，至今已

有千百年历史。这项技艺在 2008 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到了 2010 年，它又作为中国剪纸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艺术特征来看，该手艺延续了楚文化“崇凤尚赤”的传统，凤凰纹样十分丰富，色调上以大红色为主，刀法细腻，构图也颇为灵动。与北方剪纸那种粗犷风格相比，两者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它被视为荆楚水乡文化中一个典型的视觉符号。不过，已有调研结果显示，这一非遗项目至今尚未建立起系统性的对外译介体系，现有翻译材料比较零散，质量也参差不齐[9]。相较于福建剪纸、河北蔚县剪纸等同类项目，它在国际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上都还有明显差距。

近年来，大语言模型普及速度很快，AI 翻译能力也有了明显提升。2022 年，“人智协同”作为规范术语，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和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人机交互专业委员会联合发布，这标志着人机协作从技术实操层面正式上升为学术概念[10]。翻译行业也早已从“机器辅助人工”的初级模式，向“人机深度协同”的方向演进[11]，但通用 AI 工具在处理文化负载极高的非遗文本时，仍易出现“文化失语”——字面翻译准确，文化意味却未能传达。

面对前面提到的现状，这项研究将仙桃雕花剪纸作为一个具体案例，尝试将人智协同的思路融入到非遗翻译实践中，进而找到一条对外译介路径，既顾到了效率，也能守住文化保真度。研究内容大致会从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先做实地走访，再把相关文献梳理一遍，把仙桃雕花剪纸在翻译中遇到的真实痛点尽量理清；二是围绕该项目的多模态特征，搭建一套人智协同式的工作流程，使它更合用；三是让翻译实践更有系统性，将工艺术语和民俗纹样这类内容都收纳进来，建成一个小型术语库。这个术语库一方面能直接支持仙桃雕花剪纸走向海外，另一方面也能给同类非遗项目的对外传播提供一些参考，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2. 研究理论和方法

本研究依赖人智协同技术作为实践基础，运用共生理论来阐释各种翻译行为，多模态作为翻译实践方法，以此搭建适配仙桃雕花剪纸翻译路径。

2.1. 人智协同技术

“人智协同”(Human-AI Collaboration)指的是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在协作推进任务时，通过分工配合、优势互补形成的一种工作模式[10]。2022 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联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人机交互专业委员会，正式发布了“人智协同”这一术语，把它界定为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经过合理分工与深度协作，共同完成复杂任务的人机交互范式。这次术语的确立，表明人机关系已经从“工具使用”阶段，开始向“协同共生”的范式发生转变。

在翻译场景中，人与 AI 各自的优势边界相当分明。一方面，AI 的长处在于速度快、能承担大批量任务，并且术语记忆精准，可以快速地处理成批的文本，把术语规范统一起来，还能一次性生成出多个不同风格的版本。另一方面，人的长处则在于懂文化、会审美，能把握好传播中的分寸感，译者心里清楚哪些地方应当直译以保留本色，哪些地方需要添加注释来降低理解门槛，又有哪些地方要根据受众习惯去调整风格，让传达更加到位。

在翻译领域，人智协同也不是一蹴而就，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计算机辅助翻译”(CAT)阶段，将翻译记忆库、术语库作为核心工具，人始终处在主导位置，机器仅提供检索辅助；第二阶段为“机器翻译译后编辑”(MTPE)阶段，初译先由机器完成，之后再由人工去修正、润色；第三阶段即当前的“人智协同翻译”阶段[7]，AI 会参与到整个翻译流程当中，术语提取、风格适配、多版本生成、质量评估等环节都有它介入，人的角色也从“翻译者”变成了“审校者 + 策略制定者 + 文化把关人”，二者之间由此形成一种动态协作的共生关系。

2.2. 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人机关系

共生理论(Symbiosis Theory)并非社会科学内部土生土长的概念,它最早来自生物学,由德国微生物学家海因里希·艾顿·德贝里 1879 年提出,当时所指的是不同生物在共同生活过程中彼此形成的相互关系。林恩·马古利斯进一步拓展了生物共生学说的内涵[12]。后来这一理论被社会科学领域吸收过去,用来指称事物或单元之间那种彼此促进、共生共荣并带有和谐统一意味的命运关系;若从结构来看,共生理论有三个核心要素,也就是共生单元、共生模式与共生环境[13]。

将共生理论引入仙桃雕花剪纸非遗翻译研究,可以构建人智协同翻译的共生系统分析框架。共生单元就是参与协作的两方—翻译人员和 AI 智能体。人的核心能力是文化素养、审美判断和跨文化传播意识, AI 的核心能力是语言处理、信息检索和批量生成。二者通过信息交换、能力互补,共同完成翻译任务。

共生模式就是双方在分工协作中采用的具体做法。若把任务难度作为划分依据,这类做法大体能分成两种:一种是基础文本转换,以及术语一致性检查之类的任务,难度不算高, AI 有独立完成的能力,可视为一般协同;另一种则落在文化意象转译,以及传播风格把控等复杂环节上,人不仅要深度介入,还得对其中事项作出决策,这便是高端协同。需要看到,这种模式不会固定不变, AI 技术每迭代一次,操作人员的熟练度逐步提升,协作方式也会随之被优化,并逐渐完成升级。

从翻译任务的不同阶段来看,人与 AI 之间的共生关系并不是静止的,它会呈现动态演进的特征,这对应着共生理论里从偏利共生走向互利共生的演化路径[14]。刘满芸提出翻译的共生本质,说到底在于异质文化之间能够互动,也能彼此契合;翻译活动本身,也就是不同语言文化相互共生的过程,而译者处在共生中介的位置上,承担着文化平衡与意义重构的职能[15]。在术语提取与一致性校验阶段,人与 AI 之间更接近偏利共生:面对成批术语, AI 能独自完成识别,进行库内比对和初步筛选,只有那些未被收录、情况又比较异常的术语,才会被提交给人工来判定;重复性劳动大多由 AI 承担,人工仅处理边缘决策,整体协作成本低,执行效率高。在审美润色与文化等效判断阶段,双方又会转向互利共生: AI 可以提供多种风格的译文备选,也能在文化背景信息检索上给予支撑;人工则依靠自身的文化积淀和审美经验,完成意义重构与风格打磨,双方能力形成深度互补,译文的准确性,以及表达上的适配度,也就能得到保障。从语言学视角来看,这一共生过程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共生思想相契合——语言系统本身便是共生演化的结果,人与 AI 的协作,本质上就是两种符号系统在互动中彼此适配,通过信息交换实现共同进化[16]。随着协作频次增加、术语库迭代优化,二者之间的共生关系便会从初级的任务分工,慢慢走向高阶的默契协同,协作摩擦持续降低,最终让效能出现跃升。

共生环境就是影响协作效果的所有外部条件,比如 AI 技术发展水平、非遗数字化程度、文化出海的政策导向、外语人才的培养体系等等。现在国家大力推动文化数字化、支持中华文化走出去, AI 技术也在快速普及,整体环境对非遗翻译的人智协同是很有利的。

2.3. 多模态翻译方法

传统的翻译工作大多只作文字处理,但非遗的呈现形式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文字载体。以剪纸为例,除了介绍性说明文字,纹样本身就能构成一套独立的视觉语言,这里面藏有大量民俗密码。如果只把说明文字翻译出来,却不解读图案背后的寓意,海外受众就会只看到表面图案,读不懂其中真正的文化价值。

多模态翻译(Multimodal Translation)是翻译研究的新兴方向,其理论基础可追溯至 Kress & van Leeuwen 对多模态话语的分析[17]。该研究突破了传统纯文本翻译的局限,将图像、声音、手势等符号模态纳入翻译研究范畴,这一分析框架也已被国内研究应用于庐剧等非遗项目的外宣翻译实践,验证了其在视

觉、听觉类非遗传播中的适用性[8]。对剪纸这类视觉非遗来说,翻译就远不只是文字转换了,它更是一种对视觉符号的文化解码——需要把画面里的造型、构图、纹样和寓意,都转化成目标受众能够读懂的文化阐释。

这项任务恰好契合人智协同的工作逻辑:其中, AI 可以承担图像识别、文本初译、信息整合等基础性工作,人则专注于文化意义判断、审美价值阐释和传播效果把控,两者相互配合,就能打通“图像识别-符号解码-文化转译-文本生成”这条完整链条,从而有效解决传统翻译中图文脱节的问题。

3. 仙桃雕花剪纸文化特点和翻译现状

仙桃雕花剪纸兼具江汉地域审美、繁复刀法与民俗象征寓意,翻译时不仅要把握住它的技艺特征,也要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然而,在传统翻译实践中,存在一些痛点,像专有术语找不到对应表达,民俗意象在转换中有所损耗,文化信息也容易被简化,很难将剪纸非遗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完整传递出来。本研究把仙桃雕花剪纸当作翻译案例,尝试将 AI 智能体引入到翻译实践当中,借助智能体自身的文化知识库和语境适配能力,有针对性地去化解传统翻译中的困境,并为非遗民俗文本寻找一条对外翻译路径,让人智协同在其中能发挥作用,使译介更可行。

3.1. 仙桃雕花剪纸文化特点

仙桃雕花剪纸,古称“沔阳雕花剪纸”,俗称“花样子”,是流传于江汉平原的传统民间艺术。其历史可追溯至南朝时期,《荆楚岁时记》[18]已有“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的记载。明末清初形成独特艺术风格,以“刻”代“剪”,在蜡盘上用刻刀雕出绣花纹样,可同时叠刻一二十层白纸,工艺精细度远超普通剪纸[19]。

该技艺最突出的特点是“崇凤尚赤”,为楚文化的活态传承。楚地自古崇拜凤凰、崇尚红色,仙桃剪纸中凤凰主题纹样极为丰富,如丹凤朝阳、双凤朝阳、凤戏牡丹、龙凤呈祥等经典题材。凤凰造型亭亭玉立、展翅高翔,延续了楚文化中自信向上的精神气质。色彩上以大红色为主调,尤其是婚俗剪纸全用朱红、大红纸张,喜庆热烈,楚文化的审美遗风非常明显。

艺术风格上,它兼具南方剪纸的细腻和江汉水乡的灵动,构图饱满、刀法工整、线条圆润,写实里带着写意,和北方剪纸的粗犷豪迈形成鲜明对比。

3.2. 仙桃雕花剪纸翻译难点

经过梳理,待译内容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艺术语,比如“蜡盘”“破工”“花样子”这类行话,它们多是老艺人口耳相传下来的说法,英文里找不到直接对应的概念,如果生硬直译,就很容易让人迷惑。二是民俗纹样,像“连年有余”“福禄寿喜”这些,字面意思虽然容易翻译,但背后的谐音双关和象征寓意如果不解释清楚,海外受众就很难真正理解其中的吉祥文化。三是作品解读,这类文字既要说明工艺,又要谈论审美,还得传递文化意涵,对语言分寸感的把握要求最高,也是机器翻译最容易出现偏差的地方。

3.3. 仙桃雕花剪纸翻译通病

查看目前现存的所有仙桃雕花剪纸英文材料,发现诸多翻译问题。详述如下:一是术语译法混乱,缺少统一的标准。光是“雕花剪纸”这一项,就出现了“carved paper-cut”、“engraved paper-cut”、“die-cut paper”等好几种译法,不同渠道的用词各行其是,显得不专业。二是文化内涵的传达并不彻底。绝大多数机器翻译只停留在字面转换的层面,例如把“连年有余”直译成“year after year surplus”,完全没有去解释背后的谐音双关和吉祥寓意,海外受众看了之后只会一头雾水。三是图文之间相互脱节,缺少关

联。图片与文字各自独立，没能把视觉纹样同文化寓意串联起来进行解说，海外受众看到的仅仅是一张红色剪纸，却不知道纹样当中蕴含的民俗内涵。

4. 基于 AI 智能体的仙桃雕花剪纸翻译流程

若借助共生理论这一分析视角，该翻译流程本质上就是人与 AI 这两类“共生单元”在某种外部条件之中结成的一种协同“共生模式”。在这个模式里，AI 智能体与翻译人员属于核心共生单元，前者拥有语言算力，后者具备文化审美能力，双方在核心禀赋上恰好互补；第四步分层协作机制也会让共生模式具备动态优化的可能，不同任务难度下，人机分工的边界因此被划得更清楚；AI 技术迭代、非遗数字化建设以及国家文化出海政策，又共同组成了支撑整个体系运转的“共生环境”。顺着这一思路，该研究试着搭建“AI 初译 + 术语检索 + 多方案生成 + 人工审美校验与文化等效判断”的四步翻译流程，以期将上述传统翻译难点与痛点逐步化解。

4.1. 充实 AI 非遗知识库

如若直接用 AI 去翻译非遗内容，效果肯定会出问题，所以第一步就要为它“补课”。研究者把调研中收集到的工艺术语表、纹样寓意集、作品背景资料等所有素材，都整理成了结构化语料，再借助提示词把翻译原则、风格要求和文化背景一一明确下来，这等于给 AI 进行了一次非遗专项培训。

4.2. AI 主导批量初译

基础产能的部分全部交给 AI 来处理，着力点就是一个效率优先，主要做三件事：一是批量产出初稿，像工艺说明、历史介绍这类标准化程度较高的文本，直接由 AI 生成初版译文，速度上要比纯人工快。二是术语自动校验，AI 会自行识别文本中的专业术语，再与已经建好的术语库进行比对和统一，碰到未收录的新术语时，也能自动生成候选译法并做好标记，交给人工去最终审定。三是多版本生成，针对同一段内容，AI 可以一次性产出正式书面版、简洁宣传版、通俗解说版等不同风格的译文，后续人工直接按需选用就行，不必从零开始。

4.3. 人工主导质量把关

AI 生成初稿以后，人工便要主导核心环节，其中有三道关口需要重点守住：一道是文化等效性校验 [20]，审校时，人工要集中注意力到文化负载词的转译效果上，判断译文是否将原文的文化内涵准确传递出来，若有必要，还需补充文化注释。比如“丹凤朝阳”这个表达，若只译成“red phoenix facing the sun”显然不够，最好再说明它含有“光明与吉祥”的文化寓意。另一道是审美风格把控，剪纸非遗翻译不像产品说明书，译文要能体现出一定的文气和美感；机器译文常常偏生硬、刻板，人工就得做润色和调整，让英文也能贴近剪纸艺术那种雅致感。还有一道是传播适切性判断，翻译策略要跟着目标受众来变：如果读者是普通海外游客，表达可以通俗一些，多作解释；若面向汉学研究者，则要严谨些，文化专有名词尽量保留，并配上注释。

4.4. 闭环迭代优化

若从共生模式自身的演进逻辑看，人智协同并不是一次性的静态操作，它更像是两个共生单元之间持续交互，让共生模式处在动态闭环中并不断得到升级。人工审校时产生的修改结果，会被反向输入到 AI 系统当中，用来更新术语库，也能优化提示词，还能将翻译偏好也一并调整；每完成一批内容，人与 AI 之间的协作适配度就会往上提一点，协作摩擦也会持续降低。共生模式于是由“AI 初译 + 人工修正”这种基础形态，走向“人机默契协同”的更高阶形态，良性循环也会慢慢形成，呈现出互利共生的态势。

5. 基于 AI 智能体的仙桃雕花剪纸多模态翻译模型

若以共生理论审视该模型,三层联动结构本质上是人与 AI 两个共生单元在多模态翻译场景下的具象化共生模式:不同模态的翻译任务对应不同的人机协作强度,形成分层匹配的协同机制。针对剪纸图文一体的特点,本文提出“非遗文本-视觉符号-文化语境”三层联动的翻译模型,解决传统翻译图文分家的问题。

5.1. 语言文本层

这一层处在最基础的位置,语言智能体负责处理所有说明性文字,重点落在术语统一与信息准确上。AI 是主要承担者,凭借专属术语库让专业词汇前后一致,也借助语言模型维持语句通顺度。文本模态翻译上,借用 Venuti 提出的异化和归化概念[21],并结合非遗翻译的文化传播目标,将其引申为“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操作原则。对于那些带有鲜明文化意味的专有名词,像“沔阳”“雕花剪纸”“蜡盘”等,就用拼音加注,或直译加注释,走异化策略,将文化特异性留下来;若涉及说明性、描述性内容,则转向归化策略,让译文更贴合目标语表达习惯,可读性也能随之提升。这一层面主要由 AI 共生单元执行,人工共生单元只负责最终校验,协作复杂度不高,属于基础层面的共生协作。

5.2. 视觉符号层

在剪纸翻译当中,这一层是最有特色的一环,视觉智能体所负责的,正是图案背后那些不太容易察觉的视觉密码。若要完成这一步,AI 在图像方面具备的能力,需与人的文化知识相互配合:先让 AI 借助图像识别,把剪纸作品拆解开来,从中辨认“凤凰、莲花、鲤鱼、蝙蝠”等基础造型元素;随后再拿纹样知识库作对照,把视觉符号映射成文化概念。比如,“蝙蝠”会对应“福”,“莲花加鲤鱼”会指向“连年有余”,而“龙凤”则关联着“祥瑞与和谐”。经过这样的转换,“看得见的图案”便成了“读得懂的寓意”,形式与内涵之间也由此接上了关键的一环。拿经典作品《连年有余》来说,AI 会先识别出画面里的核心元素,也就是“莲花与鲤鱼”,再顺着符号对应关系,把“莲”谐音“连”、“鱼”谐音“余”这层意义逻辑关联起来,最后得出“祈愿生活殷实、年年富足”的吉祥内涵。这样的解码过程,纯文本翻译往往无法完成。在这一层面,两个共生单元需要深度配合,信息也要互通,在复杂度上,它处在中等水平的协同共生模式里。

5.3. 文化语境层

这一层处在翻译流程的最高位置,整体文化框架需由人来主导搭建,文化语境翻译也不只是解释某个单独纹样,还要把纹样放回楚文化,以及水乡民俗和传统礼仪的背景中去说明。以仙桃雕花剪纸为例,介绍时若能交代它的来路、民俗里的使用场合(比如岁时节令、婚丧嫁娶)以及审美习惯,海外受众会更容易建立起认知坐标系,之后再看具体作品,理解上也就有了依托。翻译策略在这一层不能固定,得随传播目标灵活调整:若面向大众传播,重点会落到“文化可理解性”上,类比和解释可以多用一些,把文化门槛降下来;若读者是文化研究者,则更看重“文化本真性”[22],学术表述与原生概念,能保留就尽量保留,注释也要详尽。文化转译者这一角色,由译者来承担,补充哪些信息、转换哪些概念、强调哪些价值,这些判断都会由译者来完成。与此同时,文化语境层还会把共生环境的影响传导过来——楚文化自身的地域特点、中国非遗所处的国际传播语境,以及海外受众在文化认知上的水平,都会反过来牵动前两层在翻译策略上的取舍,让共生模式跟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作出适配调整。

从技术实现路径来看,视觉符号解码可依托计算机视觉技术体系完成,当前已有成熟的技术方案可支撑剪纸纹样的自动化识别与提取。首先让图像分类模型去定位剪纸中那些彼此独立的纹样元素。传统

剪纸的图案往往繁复,风格也不单一,面对这种情形,可把多模态分类方法引入进来,并在其中融入 CLIP 文本特征增强,让文本语义去带动视觉特征的学习,小样本场景下剪纸纹样分类的准确率,也能因此得到提升[23]。随后,纹样的精细识别,则要依靠特征提取与匹配技术;若采用一种识别方法,它基于空间约束特征组合与选择,可把空间金字塔模型结合进来,用它提取剪纸形状特征,再借助 AdaBoost 算法筛出区别性特征,形状特征处在低层,语义处在高层,二者之间的“语义鸿沟”问题,也就能得到处理,像动物、肖像、文字等不同题材的剪纸,都能实现有效识别[24]。最后将提取到的纹样特征,与事先搭建的纹样文化知识库做特征匹配,从视觉符号走向文化概念,这一映射便完成了。当前主流的多模态大模型,已经具备基础图像识别与语义关联能力,大部分常见纹样的自动解码,它们可以承担;可一旦遇到复杂构图,或纹样彼此重叠,识别准确率仍会打折扣,人工校验和修正便必不可少。

这三个层面并非各自独立运作,它们之间更像层层推进又互相依靠的关系:语言文本层先搭建基础的信息框架,视觉符号层再往里面补意义内涵,文化语境层则构建一套完整的文化处理体系。前两层里,识别和初加工的任务多由 AI 承担;第三层中的判断与重构则交给人来完成,同时,前两层的产出最后也要经过人的把关。如此一来,这套模型就不再受传统“文字到文字”翻译局限的束缚,图、文、意能够被放在一起完成一体化转译。对剪纸这一类视觉非遗而言,文字意义翻译、符号意义解码以及文化语境层面的意义构建,这三件事只有同时做到,彻底的意义传达才有可能实现。

6. 结论与展望

仙桃雕花剪纸翻译要兼顾效率与质量,不能由纯粹人工或智能体各自承担全部任务,而以人智协同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时, AI 恰好能处理规模及效率一类的困难,人则可以集中于文化、审美的分析,这种配合正好使速度与质量达到平衡,是目前最可行的路线。其二,多模态翻译对剪纸这类视觉非遗的传播很有助益。传统做法只限于文字翻译,这就忽略了非遗中视觉要素的根本意义,而三层联动的多模态方法把图案、纹样乃至寓意都纳入翻译视野,使得国外受众不难掌握文字又可理解纹样,真实地触及文化。其三,术语标准化属于非遗对外传播的基本前提。现在翻译上种种混乱现象的主要成因即缺乏统一术语,建立一套规范的双语术语体系正是走向体系化传播的起点。按人智协同的思路搭建术语库,效率高、费用低,各类非遗项目基本都能较快展开。其四,人与 AI 是彼此促进的合作关系。就共生理论来说二者不是互相取代的竞争者,而是互为依托、互为补充的共生体 - AI 技术虽有发展余地,但人所拥有的文化判断、审美眼光的核心资源,人也正因善用 AI 而能集中力量做更高价值的文化传播。

这项研究对非遗保护与对外传播工作,也提供了比较实际的参考。在技术应用方面,对待 AI 要抱持理性的态度:不必把它神化,也不必一味排斥。非遗翻译不能直接套用翻译大模型,一定要结合非遗自身的特点去进行定制化调整,同时配上人工文化把关。总之,技术永远只是手段,传播文化才是真正目的,这个主次关系不能颠倒。在人才培养方面,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应向“语言 + 文化 + 技术”的复合型方向转型。新文科背景下,非遗对外翻译人才不仅需要扎实的语言功底,还需要深厚的文化素养与熟练的翻译技术应用能力[25]。高校可以实践项目形式推进非遗翻译,让学生在真实的场景中去历练,这样既能服务于地方文化建设,也能培养胜任非遗对外文化传播工作的专业人才。在传播策略方面,不宜一套译文用到底,完全可以针对不同受众去制作对应适合版本:面向大众传播就偏向通俗化一些,面向专业传播就偏向学术化一些。有了 AI 的辅助,制作多版本的成本会较低,传播效果却能增强。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挑战和局限。术语覆盖范围有限,本次构建的术语库仅涵盖仙桃雕花剪纸的核心工艺术语与经典纹样,全品类、全场景的民俗术语体系仍需逐步扩充,方言类、口述类行话的转译仍存在难度; AI 在复杂构图下的纹样识别准确率,仍有提升的空间;而译文的实际传播效果和海外受众的接受度,还未进行大范围实证调研。后续的深化可以从三个方向展开:其一,扩大覆盖面,把这套

模式推广到更多荆楚非遗项目当中,逐步构建起一个区域性的非遗对外翻译体系;其二,推动技术深化,融合更为成熟的图像识别和知识图谱技术,来提升多模态翻译的自动化程度;其三,强化效果验证,建立翻译质量评价与受众反馈机制,用真实的反馈数据去持续优化翻译效果。归根结底,AI 是人的智能协同伙伴,文化传播最终要依靠人。只要牢牢守住文化本真的底色,用足技术赋能的助力,这些从先辈手上传下来的非遗瑰宝,就一定能够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隔阂,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出中国文化的魅力。

基金项目

2026 武汉纺织大学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基于 AI 智能体的国家级非遗仙桃雕花剪纸翻译研究”。
2026 武汉纺织大学校级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AI 智能体赋能纺织故事外宣翻译教学”。2026 武汉纺织大学校级创新基金“基于 AI 智能体的非遗外宣翻译实践研究”。

参考文献

- [1] 陈芳蓉.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的难点与对策[J]. 中国科技翻译, 2011, 24(2): 41-44.
- [2] 孙嘉敏. AIGC + 非遗多模态翻译的国际传播效能提升路径——以新会葵艺为例[J]. 数字化传播, 2026(2): 19-21.
- [3] 陈卫红, 徐艳利. 数智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译介创新研究[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3): 124-132.
- [4] 郑泽蕾, 刘润泽. 非遗术语翻译的知识理据创新及其应用研究——以剪纸为例[J]. 中国科技术语, 2022, 24(2): 85-91.
- [5] 乔晓光. 从中国到世界: 剪纸文化的交流与互鉴[J]. 文化遗产, 2024(1): 18-25.
- [6] 王丽莎. 数字化赋能阜阳剪纸非遗传承保护及推动创新发展路径研究[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5, 40(7): 26-33.
- [7] 王均松, 肖维青, 崔启亮.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驱动的翻译模式: 嬗变、动因及启示[J]. 上海翻译, 2023(4): 14-19.
- [8] 汪祺, 严家凤, 徐睿. 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角下皖西非遗文化外宣翻译研究[J]. 滁州学院学报, 2025, 27(6): 67-72.
- [9] 杨荣广, 朱战炜, 黄忠廉. 湖北非遗对外译介传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 湖北社会科学, 2023(2): 69-75.
- [10] 联手人机交互专业委员会: “人智协同”术语发布[EB/OL]. 2022-07-01.
https://www.ccf.org.cn/Media_list/gzwyh/jsjsysdwyh/2022-07-01/789818.shtml, 2026-09-27.
- [11] 王华树, 王鑫. 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技术研究: 应用场景、现存问题与趋势展望[J]. 外国语文, 2021(1): 9-17.
- [12] 林恩·马古利斯. 生物共生的行星-进化的新景观[M]. 易凡, 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 [13] 袁纯清. 共生理论及其对小型经济的应用研究(上) [J]. 改革, 1998(2): 101-105.
- [14] 于雪, 翟文静, 侯茂鑫. 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共生的模式及其演化特征探究[J]. 科学与社会, 2022, 12(4): 106-119.
- [15] 刘满芸. 共生理论视阈下的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16, 37(3): 20-25.
- [16] 向大军.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共生思想[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8(5): 525-532.
- [17] Kress, G. and van Leeuwen, T. (2001)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Arnold.
- [18] 宗懌, 杜公瞻. 荆楚岁时记[M]. 姜彦稚, 辑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19] 卢郁.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的传承与创新研究——以沔阳雕花剪纸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武汉纺织大学, 2021.
- [20] Nida, E.A. and Taber, C.R. (196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Brill Publishers.
- [21]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 [22] 刘魁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性、本真性与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J]. 山东社会科学, 2010(3): 24-27.
- [23] 张新生, 陈鼎, 秦一冰. 基于 CLIP 文本特征增强的剪纸图像分类[J]. 计算机应用研究, 2025, 42(7): 1994-2002.
- [24] 邵健, 王霏. 空间约束特征组合与选择的剪纸识别[J].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2011, 23(5): 778-783.
- [25] 李锡阳, 彭丽华, 金慧. 技术赋能的人机协同翻译教学模式构建研究[J]. 外语界, 2024(3): 43-50.